

中外文学交流史：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学术

——关于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通讯

严绍澍

林森学兄大鉴：

你好，本月中承蒙你和编辑祝丽到北京，大家聚谈，甚是欢洽。由你领衔设计，集合全国一流学者撰著《中外文学交流史》，竟得15卷之巨，十分感动。15卷《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完成，将有可能开始全面厘清我国文学与世界各主要文学系统之间的生动而有趣的关系，并为比较文学在理论和实践的多个层面上提供极有价值的研究经验，也将生动地、较为全面地展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价值，在国际比较文学史上也应该说是第一件很伟大的工程，因为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组织起这样的阵容来从事这样切实的以“文本细读”为“本位”的如此宏大的“文学关系”的阐述。

欣闻7月2号到4号，各卷的撰稿人将不顾酷暑炎热，兴致勃发，聚首南京，与林森兄一起共商起笔大计。先是祝丽给我电话，继后林森兄电话再三，Email不断，申述旨意，征求“看法”，使我深为感动。

我自己是游荡在以“比较文学”为中心的人文学术中的一个兵勇，只是对有些学科和有些学科的有些层面，常常寄生兴趣，随心而发；偶有所得，撰记成篇。虽有书论若干，终不成体统。我有时候也作奇想，希望就某一层面的研究能够作一较为深入的阐述，然终非个人能力所及。现在听闻学兄与国内诸位仁兄一起，担纲如此重任，不觉欣欣然而释怀焉。由此则对《中外文学交流史》充满期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乐黛云先生曾经主编过《比较文学丛书》，中有“文学关系史”数卷，在当时甚得好评。拙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不仅有香港印本，当时台湾和日本都准备刊出，只因为“六·四”事发而告中断，但中外学者引

用此书者不少，后来当他们奔告可以刊出时，我又觉事过经年，自己在书中的若干论说好像有了新的思考，将老书再献给读者总是汗颜的事情。但从这件事还是可以看出学界对中国学者论述“中外文学”的关系是相当看重的。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各个层面的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多元文化语境形成的“文学关系”之中的，即便是超越“关系”阐述的“诗学研究”也是建立在事实上的“关系”之中的。顺便说一句，我在“比较文学”中游荡二十余年终于觉悟到所谓的“平行研究”实际上与“诗学研究”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我说的是有价值的“诗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建立在更加广泛的“文学关系”上的智性表述，而所谓的“平行研究”这样的概念，遑论它的命名者的莫名其妙，只说在学科的具体实践中，它其实是一个在本质上无法操作而在行为上又可以任意为之的“伪命题”，今天我不与你讨论这个虚假命题中的“证伪逻辑”，也请学兄不必对他人言“严某人视平行研究为伪命题”，否则必有人要打死我无疑的。

我想，我们一定要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当成是“比较文学”中的基础性学术，给予超越现在“重视”的“更加重视”。一个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的人，不管他在什么层面上展开研究，如果他对研究对象的文学或文化的世界性的历史联系没有知识，对作为“对象”的文学或文化在人类总体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没有把握，他的一切的研究最终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长期的检验，就如同我们现在评价以往的学案，其理是相同的。

当前“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已经比二十年前我们撰写“中外文学关系”时的条件好多了，“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换和提升。当时是一种“摸索”的状态。我在做《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时候，检索日本文部省编辑的有关材料，从1900年到1980年，中国人写的关于“中日文学关系”的论文只有3篇。就是说，每将近三十年我们才有一篇论文发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语境呀。现在的学术语境有了几乎翻天覆地的转变，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文学关系”层面上所作的研究极大地提升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水平，并且在若干层面上推进到了被国际学界同行美誉为“真正的比较文学”，相互对话，互补互进。我们的研究者可以而且应该站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向前延伸和推进。

我个人更愿意把“文学交流”定义为“文学关系”。近三十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界在推进“文学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获得了超越以往的业绩，在研究思路与阐述表述诸层面上出现了不少具有学者个性的思考。我个人思索“文学关系”即“文学交流”研究的最终极的目标或接近终极的目标，并不在于只是表述“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而应该是在特定时空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在“文化”与“文学”的广

泛又极细微的流动中,一种性质的“文化”A(这里指称的“文化”当然是包含文学的,而“文学”的传递一定是以更广泛的“文化”为助力的)以各种形式和姿态透入另一种性质的“文学”B中,于是便引起了B的内在机制发生各种“变异”,正是这一“变异”使得A在整体上或在若干层面上被“解构”,而促使B在相应部位上发生“变异”,最终可能形成“文学变异体”。依据我们对东亚文学生成的已有的认知,脱离了蒙昧而进入到文明时代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内部,都存在着在不同的时空中形成的“文学变异体”。各种“文学变异体”的形成,表明了“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流动的文化本质,成为各民族文学成长与发育的标志之一,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成果的一翼,体现了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比较文学的学理上说,我以为这就是各民族“文学关系”即“文学交流”的最本质的表现。

当我们在阐述这一传递过程中这样复杂而有趣味的轨迹时,我体会把握“多元文化语境”、“变异与变异体文学”和“文化传递的不正确形式”这样三组关键词所构成的范畴可能是思考的关键。在这些层面中推进的研究,或许能够更加接近文学关系的事实真相并呈现文学关系的内具生命力的场面。我之前出版的《比较文学视野中日本文化》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努力基于这样的学理而撰写的,得到学界同行的一些认同,我很是感动。

我个人还体验到从事“文学关系”研究的人必须具有“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立场,并作为观察文化现象和阐述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的基点。提出这一点或许是多余的,但这是因为我读到了一部分意识十分强烈的文章而心生担忧。追求“民族平等”和实现“民族和谐”是全人类包括马克思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文学关系”的研究最能触动“民族关系”的神经。我期待本书各卷能够以事实真相为基础,既充分展现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又能够实事求是地表述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丰富多样性的积极的影响,把“中外文学关系”确切地表述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互动的历史性探讨。

顺便提到一件事情。今年5月,我在审查南开大学一部博士论文时投了“不赞成”的“反对票”。有人戏称我为“凶神恶煞”,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该论文题目为《〈古事记〉与中国文化》,他在前言中说,“国内学者关于日本神话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论著不多。除了周启明的译本和我的导师的一篇论文外,未见有其他的著述。”这是在“文学关系”研究中“不读书”的典型表述。我随手检查到中国学者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著近21年来就有52种,就为他列了一个目录。我想,充分掌握已经有的研究成果与表述自己个人独到的见解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文学关系”即“文学交流”研究,必须把自己的阐述不仅放置于“文本细读”的

基础上,而且也必须放置于本门学术史总体线索之中,愈是能够把握总体内学术成果的学者,便愈是能够深入地阐述自己的见解。

这两年我参加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指南”(外国文学)组的出题活动,去年的“项目指南”中便设计了一项“文学发生学”研究,可以在这个宗旨中从事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我在阐述项目意义的时候,认为它应该有广阔的思考和表述的空间。但结果使人遗憾,呼应这个宗旨从事论著者寥寥。这又反映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中虽然从事“关系研究”的人愈来愈多,但真正能够深入文学内部运行中考察,在文学的“变异”中阐明“文学新体”的研究者正是太少了,有时候让人感到寂寞。现在,由钱兄总其纲而又有这么多的同行朋友集合一起,几乎从整体上全面展现在世界文明图谱中的“中外”文学的互动关系,将是何等壮丽,何等辉煌!

我相信新撰的《中外文学关系史》各卷,一定能够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我啰啰唆唆地说了许多,只是以开诚布公之心答谢学兄的好意,并顺此表达对各位书卷的期待。我已经说过,我不过是这一学术中一个兵勇,随心而想,随想而说,不仅不足为凭,而且谬说不断,一笑而已。

请代为转达对参加编撰《中外文学交流史》各位的敬意。

你们的朋友

严绍瑛敬上

2005年6月30日草成于北京西郊跬步斋

2008年10月25日修订于香港